

经济评论

简 报

2012 年第 4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2 年 9 月 15 日

编者按

1. 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理念：“权利”还是“自由”.....米运生 董杰 陈勋
2. 行业性行政垄断何以破除？.....姜琪
3. 经济学可能是下一个物理学吗？.....杨华磊
4. 社会网络层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叶静怡 薄诗雨 刘丛 周晔馨
5. 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的动态变迁.....石智雷
6. 平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理论指标、实证研究及政策选择.....张原 沈琴琴
7. 引入产品质量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及中国经验证据.....汤二子 孙振
8. 产品市场竞争与实际控制人变更对上市公司业绩的交互影响.....谢梅 李强
9. 中国的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价格波动.....王学龙 杨文
10. 新圈地运动——揭秘房地产开发商囤地背后的故事.....王岳龙
11. 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赵文军 于津平
12. 中国的“三元悖论”政策目标组合选择及其影响.....杨艳林
13.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价格动态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文争为
14. 历史事件会长期影响汇率变化吗？——关于人民币汇率与欧元汇率的比较
.....谢赤 岳汉奇
15. 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述评.....伍业君 张其仔 徐娟
16.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态思潮——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综述.....肖红蓉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将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 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理念：“权利”还是“自由”？

米运生 董杰 陈勋（华南农业大学）

《规制失灵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双重迷失：法哲学-经济学的视角》，《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近年来，农民贷款难虽有所缓解，但问题依然严峻。究其原因，制度因素较多被关注。宏观层面，Wei 和 Wang（1997）等认为，“重城轻乡”的制度结构使得信贷资金过多流入到城市和国有部门。制度执行层面，监管机构没有能够找到协调效率与公平的监管“艺术”（陆磊，2003）。这两种流行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监管机构对经济效率的考虑才是主要原因。

“监管”可以被视为监管机构向商业银行出售的“服务”。类似于工商企业，它也需要追求最优效率：效用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中国是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模式（即机构监管），监管机构类似于高度集中的垄断企业。此时，监管机构有三种典型的经济行为：它所提供的产品是标准化的；它所标示的价格是“平均”化的；只有满足某个“最低收益”时，才会进入市场。三因素使农村金融机构会因此退出市场：第一，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等鲜明的地域性，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区域性，所以需要差异化的监管。第二，与每个农村金融机构相适应的价格不同的是，它们所能承受的监管成本要低于金融业的平均水平。事实上，监管者所确定的平均价格往往超过其承受能力。第三，狭小的农村市场往往无法满足监管者对“最低收益”的要求，监管者也因此不会为其提供监管服务。三种情况使得内生于农村的金融机构无力、不愿或者无机会购买到监管服务。作为正式制度的商业银行因未获“准入”许可而被迫退出农村市场。

如可诉诸于非正式市场，那么农民的贷款难问题便不会如此严重。但现有的监管理念却使其变得不可能。面对农民贷款难问题，许多学者基于政治哲学中盛行的“权利”观念而主张赋予农民“信贷权”（陈菲，2009），但这种主张往往事与愿违。其一，一切权利都是再分配性的，既得利益肯定会抓住权利不放；其二，所有“权利”都是授予的。在哲学层面上，在对待法律的空白领域时，基于“权利”的司法实践采取“有罪推定”原则。法律上，我国政府只是禁止“非法集资”，对民间金融并未明确限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因坚持“凡未经明文允许的事均被禁止”的“权利”原则，民间金融长期被视为非法。

面向未来的农村金融监管理念是基于“自由”的功能型监管。真正的自由必须建立在三个原则之上：“个人能够选择，并且只有个人才能选择的原则”（“个人主义”原则）、“个人能够为自己选择”（“政治”原则）和“选择的意义在于所偏爱的选择方案”（“无支配”原则）。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农民贷款难的根本原因不是缺乏权利，而是缺乏经济自由。法律并没有明确限制民间金融的发展，但是政府部门和法院对待民间金融问题时，却采

取了“有罪推定”的方式。所以,从法哲学原理看,要从监管角度去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需要基于“经济自由”的监管理念,在农村建立功能型的监管模式。功能型监管的主要思想是,相同的功能应当受到相同的监管,而不论这种功能由何种性质的机构行使。与高度集中的机构监管比较,功能监管的特点表现为金融监管的分散决策和行政分权,其实质则是基于“经济自由”的“法治”精神。

要从根本上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我国需要建立功能型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在区域布局方面,理想的情况是将监管权下放到乡镇。考虑金融机构的规模经济效应和风险传染等现实因素,金融的基本监管范围以县域为宜。

2.行业性行政垄断何以破除?

姜琪(山东大学)

《转轨经济中行业性行政垄断的制度根源——基于理性政府汲税约束视角》,
《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但垄断行业改革却迟迟得不到有效推进。处于转轨经济时期的中国对电力、电信、铁路、邮政等行业的垄断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残留,主要目标可能不是谋取超额利润,而是基于产业和国家安全考虑,为了对经济实行有效控制。垄断依托的载体是国有经济,实行的手段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的内在缺陷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配置效率低下、产业发展滞后、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等诸多问题,所以,如何破除行业性行政垄断,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是中国转轨经济时期亟需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政府对某些行业的规制或垄断并非全是政府经济职能责任感的驱动,在某种程度上,更可能是政府的行政需求,处于转轨时期政府的角色是双重的。首先,经济转轨并非简单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之同步,改革意味着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客体。改革会削弱政府的权力范围和强度,但政策推行和贯彻又要依靠权力来进行。具有双重身份的政府是否会进行对社会公共利益有益的改革,是否会推行和实施将削弱自身权力的改革政策?其次,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主体,也会通过产权经营追求收益,国有产权为政府行使职能提供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当政府既是国有产权主体又是公共权力主体时,很难保证政府不用权力去谋取产权上的收益,形成与民争利的局面。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的政府能否保持中立,维护公平,促进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形成?

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执政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实现其目标的直接途径是加强对国家的控制,而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汲取税收的能力上,因为税收水平直接决定着政府可提供的制度组合,更高层次的制度组合有利于实现更高的政府效用水平。政府提高税收增长的途径有两方面:一是国家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取得的税收增长,二是国家通过加强某些行业的行政干预而取得的隐性税收增长,分别表现为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二者均直接影响政府的汲税水平。政府通过调节干预程度来间接控制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理性政府通过

税收来实现统治的可行性，故税收水平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效用水平，一定时期内，政府汲取税收的水平是受到约束的。在特定时期内，政府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可能会通过加强行政效率的手段来突破税收水平约束，对经济实行过度干预，以实现其当期效用最大化。比如，西汉的盐铁专营在短时间内就能积聚大量财富，充盈的国库为汉武帝抗击匈奴提供物质保障。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扼杀竞争，这是一种典型的“与民争利”的短视行为，虽然可以使国有企业暂时获得丰厚的垄断收益，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能因此得以提升，但是却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抑制整个行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外界条件的变化，政府同样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会放弃突破税收约束而选择另外一种在既定税收水平下提高效用的方法——强化市场型政府建设，逐渐减弱对经济的直接行政干预，提高经济效率。在未完成市场化改革的转轨经济时期，内生的政治均衡很难达到社会有效率的结果，政府或政治家对改革的明确态度和强有力的执行手段可能是推动社会状态向有效率的均衡移动的更好动力。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30 年强大的制度动力。放弃计划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政府在努力打破现有制度供给组合，向强化市场型政府转变。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质上是降低行政手段对经济的影响，放松对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培育良好的市场秩序，使经济能得到快速增长。

3. 经济学可能是下一个物理学吗？

杨华磊（兰州大学）

《对主流经济物理研究范式的担忧——兼议其在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经济评论》2012 年第 4 期

当第一次经济物理学（econophysics）会议于布达佩斯举行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带着经济物理学的 Stanley 模式（从现实出发，把经济系统看作由大量非线性交互个体构成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在金融领域利用统计物理、非线性及随机过程知识，进行数据挖掘，寻找经济行为中较具普适性的经验法则的物理学家们的活动）投入到这个学科的研究中，并且有人声称“经济学可能是下一个物理学”。但经济物理学的发展又过了十五年，好像并没有完成最初的承诺，甚至开始淡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界，原先支持经济物理学的少数经济学家也开始对经济物理学提起控诉。

从物理学上看，忽视非统计物理学在其领域的应用，使得某些经济现象和问题不能寻找到很好的物理映射；从经济学上看，局限在数据丰富的金融领域，追求普适性法则及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从数学上看，局限在非线性、概率统计及随机方面，忽视代数、几何以及更适合经济系统的非定量和半确定数学的应用；从研究方法上看，热衷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复杂科学，确立了从数据出发的研究模式；从理论检验上看，推崇裁判竞争性理论的数据维度，忽视形式逻辑、经验直觉、传统实验（可控实验和理想实验）、现代实验（思想实验、真人

现场实验以及网络在线实验)、数理逻辑及计算机模拟仿真在裁判理论方面的作用;从经济学的自然学派看,忽视经济学自然维度的寻找,同时其研究还面临经济和物理在学科距离上太远的问题。

金融领域仅是经济领域的一部分,构造型社会下法则并非稳定,经济学也并非有像物理学一样的解析基础;理论和数据关系,并不总是数据在前,理论在后;从数据出发的研究无法区分异构同数下的结构和机制;对理论检验也仅非数据,缺乏可控实验下,利用数据寻找两变量间的经验公式,结论噪音太大,也无法回答数据稀疏的 Smith 时代的理论如今为何依然是经济理论的基石;经济物理学致力于复杂科学在经济系统的应用,但经济学的发展远未达到利用现代物理学研究方法的高度;经济存在复杂维度,也存在简单维度;物理学在经济物理学中的应用并非统计物理学。数学在经济物理学中的应用并非统计学和随机过程,而经济物理学精确化发展依赖于经济行为空间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经济学基础变量的数理描述,采用矢量、张量及复数等数学记号,开展量纲分析和社会计算;经济学是物理学的下游学科,物理学是经济学的上游学科,故对经济物理学的探讨不考虑经济行为的自然维度,仅仅是缺乏思想的技巧性数据挖掘,同样不令人信服。但寻求经济行为的自然维度,物理学也并不总能提供处理经济尺度上涌现现象的现成模式。

中国的经济物理学发展为何如此缓慢,有上述经济物理学自身原因,也有中国特殊的情况。如长期的文理隔离,使得缺乏从事经济物理学研究的复合知识结构,同时制约着国内学者对经济物理学工作的理解;Stanley 界定的经济物理学研究模式的硬性推广,使这种范式不服中国水土;对经济研究,中国学者更赞同对经济行为存在自上而下影响的政治制度因素;当然中国学者更多认为经济物理学研究要考察经济行为决策的自然维度。

经济物理学的将来发展,需追求法则演化轨迹的普适性,注意每国具体情况,考察行为目标的多元性,研究经济行为法则成立的时空尺度,对经济系统建模要有意区分快慢变量;同时采用多元的研究范式,不仅自下而上考察交互,也应自上而下考察规范导向;涉足经济学最基本的领域,建立经济物理的理论大厦,建立行为活动的背景空间,对经济变量进行数理描述;听听主流的建议,寻找行为的自然属性和与科学技术相匹配的社会行为法则;采用新的数学工具和表述、新的实验以及新的裁判理论的方法,该是社会经济系统为研究方法、实验、数学以及裁判理论的方法立法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研究

4. 社会网络层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

叶静怡（北京大学）、薄诗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刘丛（亚利桑那大学）、周晔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个人职业生涯和社会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经济学家多借用社会学中“社会网络”概念对此现象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并阐释其内在的经济机理。从整体上看，在研究社会网络作为非正规制度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求职和收入中作用的文献得出的结论仍然充满争议，因为其往往取决于看待社会网络所采取的视角。我们的研究主要选取社会网络层次视角，探讨其对工资水平的影响。通俗地说，社会网络层次主要是指，高层次的社会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对应着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或财富水平的亲友的“关系”，而低层次的社会网络则反之。

我们的理论基础主要沿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Akerlof）及其合作者克兰顿（Kranton）的身份定位模型的思路，建立了一个针对农民工劳动市场的身份定位的模型，以解释社会网络层次对农民工工资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得到的初步结论是，由于高层次的社会网络可以通过负反馈等机制向受益于该网络的劳动者施加压力，后者有可能会因此采取与之相匹配的更为积极上进的行为，因而获得更高的均衡工资。

理论推论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我们应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09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调查的数据，充分考虑了工资收入与社会网络层次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使用倾向得分方法计算的平均处置效应对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高层次社会网络确实对农民工工资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结果看来，是否拥有高层次社会网络对月收入和小时收入的贡献率大约分别稳定在20%和25%左右。同时，我们还进一步检验了理论模型推导出的两个待检验的命题。首先，理论模型认为，高层次社会网络影响归属该网络劳动力的行为模式并最终影响均衡工资，低层次的社会网络则无此效果。实证结果进一步显示，层次越高的社会网络对收入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其中以高级管理人员对收入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而仅拥有较低层次社会网络的农民工与没有拥有任何类型的社会网络的农民工相比，二者的工资并没有显著差异。其次，理论模型认为，高层次社会网络对工资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劳动者的行为模式，即所谓的负向反馈机制，使得他们采取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劳动行为而实现的，无论它是否能带给农民工更好的工作匹配。数据分析显示，排除了社会网络对帮助找到工作的影响后，拥有高层次社会网络仍然能在开始工作后通过影响行为模式和生产率来改变工资水平。由此，研究发现了社会网络除了通过工作匹配机制外促进工资增长的另外一种机制。

上述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民工福利影响的理解，尤其是丰富了对社会网

络促进工资增长的机制的理解。如在经典的信息传递、信誉担保、筛选或屏蔽等传导机制外,研究发现了社会网络可以对农民工工作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生产率效应,这种生产效率的产生可以被视为城市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社会收益向私人收益的一种转变,这种潜在外溢效应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在中国特殊城市化与劳动力迁移发展过程中,社会网络所具有的这种外溢效应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由于具有较高层次的社会网络可以通过负反馈等机制来激励该网络的受益者提高生产率,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为其建构良好的社会网络提供平台,并使得该反馈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将有利于实现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打破原有经济体制下的各种障碍和约束,在允许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同时,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构建基于城市就业和生活的新型社会关系,分享城市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外部效应,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和相应的工资水平,而且对整个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都可能产生积极影响。

5. 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的动态变迁

石智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的动态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一直在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影响,认为收入差距在城乡迁移决策中占据中心地位,它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迁移规模、区位选择和迁移时间等。而在托达罗迁移模型中,城市是存在失业的,决定城乡迁移的不是城乡收入差距,而是考虑了在城市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的城乡预期收入(托达罗,1969)。在这一理论中,劳动力的迁移主要取决于相对经济利益的刺激,其中经济上的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劳动力的经济预期,也就是心理上的考虑和认识,而不是实际的城乡工资差异。同样对于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是否选择回流,也是会受到城乡收入预期的影响。只是迁移劳动力对于城乡的预期不仅仅是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以及获得工作的概率,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如在城市的生活成本、适应性、未来发展空间以及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善等等。

迁移劳动力的城乡收入预期是他们对城乡认识的集中体现,也是将来迁移动向的“先行指数”。农村劳动力要进城务工,是以在城市非正规部门获得一份工作为目标的,并且对在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是以非正规部门工资收入为参照的。迁移劳动力对城乡的收入预期是考虑到城乡生活成本的,不仅仅是考虑交通成本和工作搜寻费用。根据湖北省武汉市的两次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1998-2005年迁移劳动力对城市和农村的收入预期都有所增加,农村预期收入的增长幅度稍大于城市预期收入,前者增加了62.74%,后者增加61.91%。2005年,迁移劳动力对城市的预期收入平均为每月729.14元,对农村的预期收入人均为每月

354.92 元。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来看,2005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为 374.22 元,比 1998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232.24 元)高出 61.14%。

当前迁移劳动力在城生活就业和长期保障状况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对城市收入预期的主要因素。在就业选择方面,迁移劳动力成为私营企业主的比重明显上升,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逐渐从商贸零售行业转移到餐饮和社会服务行业,就业选择面更广,选择方式更为灵活。1998-2005 年劳动力的工资或收入在增长,迁移劳动力中雇主收入比雇员工资增长幅度更大。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在很大程度受到他们进城目的的影响,而他们的消费方式也反映了对以后的打算。迁移劳动力依然和家乡保持着比较亲密的联系,尤其是资金联系;但是雇主与家乡的联系较之雇员要弱一些。作为雇员和雇主的迁移劳动力的饮食方式有了较大的分异,雇主在城市生活得更为安稳和舒适,更为家庭化和生活化,他们正逐渐学会和适应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

从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来看,1998 年和 2005 年迁移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的决定因素有着明显的差异。那些年龄稍大、文化程度稍高的青壮年迁移劳动力对于留城最低收入和回流农村的收入预期都更高一些。2005 年,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对农村收入预期明显要高,依靠社会网络进城找工作的对农村收入预期更高;且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对农村收入预期更高。接受过技能培训、挣钱后希望留城发展的或者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对留城最低收入要求更高一些。长期保障状况对于迁移劳动力的留城最低收入预期有着重要影响,而对城市和农村收入预期的作用并不明显。

可以发现,随着在城就业时间的延长以及非农务工经验的积累,农村迁移劳动力群体的城乡收入预期正逐步趋于理性,他们会根据城乡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劳动力价格的波动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城乡收入预期,这将有利于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改善全社会的福利水平。近些年,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持续波动对城乡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将逐步显现,进而影响迁移劳动者个体的投资和迁移的理性决策,比如从 2004 年蔓延开来的“民工荒”现象,严重影响了城乡经济环境,各级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手段进行适度干预。对于城市就业规制方面,应着力建设公平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环境,构建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信息平台,尤其是不同地区间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信息的共享和融合,通过政策和市场手段引导劳动力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对于农村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应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制,解除农村居民和迁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应加强农村创业教育,优化创业促进政策,引导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

6. 平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理论指标、实证研究及政策选择

张原 沈琴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评论》2012 年第 4 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洲各国普遍面临严峻的失业问题和日益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制度原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僵化是始作俑者,因此主张进行

灵活化改革以恢复市场供求活力;而站在劳工立场上的研究者则认为灵活化改革有悖于社会公正与国际劳工组织(ILO)倡导的体面劳动理念,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如何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来平衡各方力量,实现最佳的劳动力市场绩效,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梦寐以求的目标。

对比欧洲各国,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就业问题同样严峻,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一直是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着力解决的问题。然而,尽管面临就业压力,我国劳动力市场法制建设和劳动者权益保护政策却持续推进,1995年和2008年实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以及2011年颁布实施的《社会保险法》构成了规范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法律体系,虽然目前的发展水平远未企及欧洲发达国家,但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形成。逐步完善的制度体系在增加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同时,是否会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从而进一步增加就业压力?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是否将不利于企业应对市场经济周期与波动?从更长远来看,中国在设计劳动力市场制度时,应如何在灵活性和安全性之间平衡,从而避免欧洲国家类似的困境?上述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对此,我们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理论框架,建立灵活安全性指标体系以衡量我国劳动力市场目前的总体状态、地区和体制内外差异,以此分析灵活安全性与宏观、微观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并提出平衡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制度模式。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货币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个人收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与大部分的灵活性之间存在负相关性,而与大部分安全性正相关,因而从提高工资水平和降低贫困率的角度出发,员工更倾向于较低灵活性和较高安全性的政策安排,因此基本能够描述出相对清晰的雇员偏好。利润总额占销售额比重、自动离职人员占有所有员工比重、人均销售额与大部分的灵活性指标之间正相关,因而从提高利润率、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员工流失率的角度来看,企业更倾向于较高灵活性的用工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但是对于安全性政策,除了人员流失率之外,从其他两项绩效出发的选择并不像员工那样明确,就业安全性不利于企业提高利润率,工作岗位安全性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保障收入安全性和组合安全性反而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因而企业更倾向于较高的灵活性和局部安全性并存的制度安排,雇主的偏好的整体状态较为模糊,但从灵活安全性的局部指标组合来看,仍然存在类似的无差异曲线。失业率、工伤和事故死亡率与灵活性、安全性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除了工资灵活性之外,灵活性和安全性较高均不利于降低下岗失业,但其对于长期失业的影响则相反,工资灵活不利于长期失业的缓解,而其他的灵活性和安全性较高有助于降低长期失业;局部的灵活和安全性有助于降低职业病发病率,安全性有利于降低工伤事故,而除了功能灵活性之外,大部分的灵活性提高都不利于降低工伤事故,因而政府降低失业率以保持较好的宏观经济指标,以及降低工伤和事故死亡率从而改善劳动关系绩效的灵活安全性选择也需要从更为具体的政策层次对症下药。

7. 引入产品质量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及中国经验证据

汤二子（大连理工大学）、孙振（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4 期

生产率不仅是维持企业短期经营以及保持长期发展的动力，而且是促进企业选择出口的内在引擎。新新贸易理论就是在微观层面研究企业出口的贸易理论，该理论假设企业所存在的异质性特别是生产率的异质性是导致企业是否选择出口的决定因素。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的相关研究基本上一致性地认为生产率高的企业才有能力选择出口，从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一般要高于非出口企业。而对于中国企业的经验研究却得出了出口企业生产率均值未必要高于非出口企业，甚至会低于非出口企业，即所谓的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中国出口企业可能存在的“生产率悖论”更是引起了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出口的相关研究，但是目前的局限是类似研究仅拘泥于经验研究，没有提出相关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生产率悖论”。

我们继续沿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分析框架，引入产品质量差异来试图解释中国出口企业可能存在的“生产率悖论”。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生产率角度研究企业出口的决定机制，由于出口市场固定成本的存在性而致使企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够出口市场获得利润从而选择出口，这样出口市场固定成本导致的生产率门槛使得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均值一般要高于非出口企业。不过，在企业资源给定的情况下，企业生产率一般要贡献于产品数量与产品质量两个方面，而由于产品质量的衡量问题使得一般仅仅使用产品数量计算企业生产率，这样在忽略产品质量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均值未必一定要高于非出口企业，甚至低于非出口企业，即出口企业存在的“生产率悖论”。总之，在考虑产品质量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均值一般要高于非出口企业，而计算企业生产率时人为地忽略产品质量会导致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均值大小难以衡量。

经典研究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一般要高于非出口企业，但是由于在计算生产率时缺乏企业产品质量的相关度量，从而在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高于非出口企业时，可能导致仅仅使用产出总量计算生产率而显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均值要低于非出口企业，即“生产率悖论”，所以“生产率悖论”很可能只是一个计算问题。根据 2005-2008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由于缺少企业产品质量的相关统计，仅仅使用产出总量衡量企业生产率而检验认为大部分行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同样由于产品质量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也不能准确地将出口企业所存在的“生产率悖论”归结为产品质量的忽视，但是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一般要高于非出口企业，这样仅仅考虑产品数量而不顾产品质量所计算的生产率肯定会人为地缩小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的，当质量差异过大时就有可能导致“生产率悖论”，从而出口企业所存在的“生产率悖论”很可能就是一个计算问题。

8. 产品市场竞争与实际控制人变更对上市公司业绩的交互影响

谢梅 李强（中国矿业大学）

《产品市场竞争与上市公司控制权协议转让——基于终极控制权视角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2 年第 4 期

产品市场竞争和公司控制权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优胜劣汰的重要机制，不同行业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存在巨大差异，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电子、金属和非金属制造等行业是公认的激烈竞争行业；石油、化学、塑胶、机械、设备、仪表、批发和零售贸易等行业的竞争程度则相对缓和；电力、煤气、信息技术及水的生产和供应等垄断行业的竞争程度则微乎其微。高、中、低三种不同竞争程度的市场对于改善上市公司治理和提高公司业绩是否具有明显差异，是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与国外流行的公开市场要约收购不同，2005 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有三分之二的股票不能自由流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让一直是以协议收购为主。通过股权协议转让，有些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发生了变更，有些则是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同时发生了变化，对于后者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实际控制人由中央、省、市和县一级政府转变为自然人、民营企业、乡镇或集体企业、外资企业、职工持股会等民间投资主体；二是实际控制人在不同级别的政府投资主体之间转移；三是实际控制人在不同类型的民间投资主体间转移。然而，白云霞等认为不同投资主体的持股目的存在较大差异，各级政府控制人之间相互转移上市公司控制权通常是出于解决就业、产业整合、组建区域大型企业集团等政绩目的，并非真正为了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民间投资主体取得公司控制权往往是投资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公司经营是否成功直接关乎其身家命运，因此民间投资主体的持股目的往往就是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增加个人和股东财富。

然而现实情况是复杂多变的，实际控制人转移方式的不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真的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吗？作为两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当产品市场竞争和公司实际控制权转移发生碰撞，二者交互作用又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即二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一种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如果二者是互补关系，那么当产品市场竞争不能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并促进企业绩效改善时，公司控制权转移将起到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如果二者是替代关系，那么无论是产品市场竞争还是公司控制权转移都可以有效促进公司业绩的提升，即二者的作用可以互相取代。

通过对 2002 年 12 月 1 日至 2006 年 9 月 1 日间发生控制权协议转让的 273 家上市公司数据的深入研究，我们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产品市场竞争对完善公司治理和提高公司业绩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并且随着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强，竞争对公司业绩的正面影响越来越显著。第二，单独分析实际控制权转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由国有投资主体转为民间投资主体对公司业绩具有正面影响，但是在民间投资主体间转移却对公司业绩具有负面影响，其他转移方式对公司业绩没有明显影响。第三，关于产品市场竞争和实际控制权转移的交互关系，研究发现：在高度和中度竞争行业，产品市场竞争与实际控制人由国有投资

主体转为民间投资主体、在国有投资主体间转移具有替代关系，而与控制在民间投资主体间转移具有互补关系；与中度和低度竞争行业相比，高度竞争行业更容易发生成功的控制权转移；在低度竞争行业，由于市场竞争作用的限制，控制权转移对公司业绩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实际控制人由国有投资主体转为民间投资主体对公司业绩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产品市场竞争与实际控制人由国有投资主体转为民间投资主体具有显著的互补关系。

9. 中国的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价格波动

王学龙（北海道大学）、杨文（北京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4 期

中国的房价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热议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9-2009 年十年间中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涨幅惊人。自从房改之后，商品房的平均价格从 1999 年的每平方米 2053 元开始不断上涨，2007 年达到了一个高峰，为每平方米 3864 元。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房价略有下降，但在 2009 年又恢复了上涨的态势，并且创出新高。虽然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平均房价的统计方法饱受质疑，但数据所反映出来的房价不断上涨的趋势与其他房地产研究机构的判断是一致的。

房价上涨让许多老百姓叫苦不迭。报纸，电视以及网络上充满了对高房价的不满情绪。数以亿计的中国百姓的思考着：为什么房价狂涨不跌？

房地产市场的捍卫者们提出了各种说法：中国人口太多，中国城市化不断推进，地价不停上涨。这些说法都有一点合理性，但无法诠释中国房价的激情。比如说城市化。北京、上海等最具吸引力的特大城市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非常显著，因此房价上涨速度加快也在情理之中。但大城市的房价上涨普遍带有一种“辐射效应”，比如北京房价上涨导致廊坊的房价也飞速上涨。这种基于大城市“辐射”而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房价快速上涨说明真实供求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可能有更加重要的因素影响中国房地产市场。

对比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教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投机资金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投机必有风险。中国房地产的疯狂从一个侧面说明投机风险不高。为什么投机风险不高？

理解关键点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卖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省市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 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 60% 以上。

中国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导致地方政府有动力支持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甚至有动力与房地产商合谋推高房价。有了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保驾护航，房地产投机风险大大降低，房地产投机行为异常严重。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高地价就是高房价的原因。住房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在严格的土地供应量限制下，住房供给的价格弹性趋于零。这就是说需求因素在房价

形成过程中应当起决定性作用。合理的逻辑是，房价决定地价，而非地价决定房价。

强大的需求是推高房价的最直接的原因。而如此强大的需求不仅来源于人口增长、城市化所带来的真实居住需求，更多的是投资需求。强大的投资需求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信念基础上的，而这个信念来自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共同设计。由于政府财政严重依赖于土地，政府就有动机推高房价。人口因素是无法通过短期政策改变的，最容易改变的是消费者的购房意愿。当房价表现出下跌倾向时，政府就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利息折扣、免交易税等等。这些政策给消费者灌输了一种“房价不会跌”的意识，从而大大降低购房的“主观风险”，增加购房意愿。因为住房需求上升，相应的土地需求也会上升，最终结果是地价上升，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那么，降低房价的措施也应当从需求方面入手，而非完善“招拍挂”程序。事实上只要有强大的住房需求作支撑，无论多么完善的招拍挂措施都对降低房价无济于事。即便招标过程公开透明，只要有“真实竞标者”存在，高地价就不可避免。即便政府把土地低价出售，也不能改变房价，因为房价是由强大的需求和有限的住房供给决定的。地价的高低只是在改变政府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利益分配。由此可见，房价不仅是一个传统经济学所描述的供求问题，更是一个夹杂政治的经济问题。这一政治经济学归纳起来就是：土地财政推高房价。

10. 新圈地运动——揭秘房地产开发商囤地背后的故事

王岳龙（江西财经大学）

《土地囤积对房地产市场绩效机理的研究》，《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即“新国十条”）后，国土资源部开始了一系列清理闲置土地的专项工作，在同年8月20日整治工作新闻通气会上，对外批露了国土资源部的工作进展：截至2010年5月底，全国共上报房地产违法违规用地宗数3070宗，面积约18.84万亩。从闲置时间上看，闲置5年以下的地块1354宗，占闲置土地总数的48%；闲置5年以上的地块共875宗，占31%；闲置时间较长，但合同中未约定具体开工时间的地块586宗，占21%，其中广州有块土地更是最长“晒太阳”17年。

为什么大量土地会被闲置，当前中国这场“新圈地运动”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经济学故事？我们认为房地产开发商事先囤积一大堆土地除了作为土地储备以防地价上涨，更多的是由于在很多房地产开发商眼里，建房子的不如倒地的更赚钱。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更公开表示，中国1/3的开发商只倒土地从不盖房，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很多房地产企业专门从事倒卖土地在业内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等到闲置土地升值后再开发或者转让，由于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且囤地成本极低，加上相比较房价的变化，地价的异动往往不直接刺激“百姓的神经”，因此开发商们对于这样一种可以“坐地升值”的行为趋之若鹜，这才是囤地的真正动力所在。

因此,国外大多数学者都把土地囤积看做一种土地储备行为,并将政府的土地供应量全部当成是开发商建造房屋的土地使用量,而很少考虑土地闲置,这在香港、韩国等房地产市场发育比较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都比较健全的国家 and 地区可能比较合适,但是在我国土地囤积更多的是房地产企业作为垄断厂商的一种策略性行为。囤积土地一方面能减少住房市场上的房屋供应从而抬高房价,另一方面能作为土地储备以防止地价上涨造成的成本上升,同时在我国土地二级市场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倒卖土地也是房地产企业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为了证实上述结论,我们先建立一个以投机为主要目的土地囤积模型,证明了在高度寡占的房地产市场中,由于地价上涨预期的存在,大房地产企业前期囤积剩下的闲置土地,在未来会更多地用来倒卖而不是生产,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的生产成本并没有因为土地囤积而得到明显降低,从而并没有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囤积土地却因此拉开了企业之间的成本差距,作为其扩张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使大房地产企业市场势力进一步增强,造成了房地产行业市场集中度的上升。随后采用 2002-2010 年中国 31 个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系统 GMM 估计对土地囤积对房价、土地转让收入、房地产企业利润的影响进行了计量检验,除了土地囤积增加房地产企业利润没有得到验证外,其他命题都得到了完全证实。实证研究同时发现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着很多房地产泡沫,房地产企业经营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马太效应”。

为了控制房价、消除房地产行业的暴利,主要应该采取如下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打破目前高度垄断的房地产市场结构,政府应该降低房地产业的进入壁垒,通过信贷支持、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各中小企业进入房地产开发市场。同时进一步加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力度,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以平抑房价。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下大力气整顿土地市场,规范土地市场的交易行为,严厉打击炒卖土地等投机行为,对长期囤积、圈而不开发的土地要严格收回,对大规模倒卖土地的房地产企业要课以重税,加大惩罚力度。同时对房地产企业正常的土地储备行为予以保护,使之能够真正起到缓解地价上涨压力作用。

11. 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赵文军(深圳大学)、于津平(南京大学)

《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基于跨期一般均衡理论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2 年第 4 期

人民币实际汇率不仅可反映人民币对外价值和购买力的变化情况,也是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表征,并在中国国际化进程中深度和广泛地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降,尤其是近年来的持续升值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原因问题也就成为政、商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已有众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决定问题展开了大量探讨,纵观既有研究成果,考证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研究偏多。有

学者考察绝对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指出经济追赶过程中终有人民币升值趋势,劳动生产率增长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有学者关注相对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汇率作用关系,认为中国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提升加大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压力,而美国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则具有相反作用。也有学者关注中国对外净资产与人民币汇率关系,认为中国外部资产余额增加对人民币汇率存在促进作用。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如各类经济性因素的冲击角度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内在变动规律。

我们首先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探讨实际外部财富(即实际外部净资产)、贸易条件、以及国内外劳动生产率对实际汇率的作用方向和机制,然后建立相应的经验模型,定量测度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外部财富、贸易条件以及国内外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是有效汇率的影响。结论表明,就长期而言,中国实际外部财富的不断大量增加会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持续升值;中国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也会促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而外国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则会缓解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压力,净效应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并不能解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波动;从长期看,中国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明显影响。短期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实际外部财富增加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正向推动作用不存在滞后效应。

保持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的建议有:首先,由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的持续大量增加,是中国实际外部财富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进而主导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因此,应加快优化国内投资和出口商品结构,大幅度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减少中国贸易顺差规模,缓解中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势头。其次,在加大引进市场导向型、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华直接投资的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本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转移国内过剩产业,增加高技术和能源类产品进口,将外汇储备资产转化为产业资本,以减轻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压力。再次,应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为国内居民开展外国证券投资提供条件,实现中国对外证券净资产正向增长,一方面减少国内流动性过剩引发经济不稳定风险,另一方面,部分化解中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压力,减缓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势头。最后,应加快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促进服务企业技术进步,力推服务业企业生产经营的系统化、标准化和规模化,以快速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缓解人民币实际汇率过快升值的压力。

12. 中国的“三元悖论”政策目标组合选择及其影响

杨艳林(华南理工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4 期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宏观经济的低迷走势使得新兴经济体稳健复苏现象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力,其中中国的经济复苏速度更是为世人瞩目。无独有偶,中国经济的这种 V 形复苏现象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出现过——尽管 1998 年经历了产出显著下降过程,中国 GDP 增长率自 1999 年起便迅速得以恢复。事实上,在“全球性大温和(The Great Moderation)”

时期中国的经济波动率也低于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两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所呈现出的这种经济稳健复苏特性愈发印证了中国宏观经济高度稳定的事实。那么,在过去 20 多年里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现象有何内生原因呢?

第一类可能解释是,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间的内在经济关联性很弱,即经济脱钩,因此得以规避外在冲击。这种解释显然与中国正积极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基本事实相悖。第二类可能解释则是,中国所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能够使其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大背景下较好地应对外部冲击,从而降低国内经济波动性。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放经济下的一国的政策选择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悖论”理论——一国只能在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金融开放三个政策目标中选择其中两个,而这也普遍认为是一国宏观经济决策面临的最基本约束条件。对 1997-2010 年间中国的“三元悖论”政策目标组合选择的分析发现,中国以汇率高度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并追求适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而谨慎追求金融开放,并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一策略对产出波动率和通货膨胀波动率的影响包括:较高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对降低产出波动率有积极作用,因持有外汇储备的间接影响使得汇率高度稳定政策也显著降低了产出波动率,金融开放同样也起到了降低产出波动率的作用;积累巨额外汇储备与追求汇率高度稳定政策间的交互影响使得汇率稳定成为维持物价稳定的消极因素,货币政策独立将降低国内通货膨胀波动率而积累过多的外汇储备恶化这种影响,金融开放将增加物价波动性。

不难发现,对我国而言,积累外汇储备起到了缓冲“三元悖论”政策目标宏观影响的显著效果,从而对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具有至关重要作用,而这一发现在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也均得到了证实。但同时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追求人民币名义汇率过度稳定既无益于国内物价稳定,也无益于产出稳定。在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追求本币名义汇率稳定意味着央行需要不断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即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一方面它将导致外汇冲销成本的产生,另一方面它也对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效应的发挥造成消极影响。因此,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向更灵活的方向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13.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价格动态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争为(重庆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4 期

近年来,人民币一直承受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敦促人民币升值以改善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进而调节全球经济平衡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具有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的政策效应吗?人民币升值真的是全球再平衡的关键所在吗?可尝试从汇率传递对上述问题做出解读。

一般认为出口国货币升值具有“奖入限出”和减少出口国贸易收支顺差的效应。由于本币升值使出口品的外币价格上升而进口品的本币价格变贵,具有降低该国出口和鼓励进口的作用。在上述两种作用力的影响下,出口国的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收支调节的弹性分析理论明确指出,上述出口国货币升值的“奖入限出”效应发生的前提是满足马歇尔-勒纳

(Marshall-Lerner)条件和毕肯戴克-罗宾逊-梅茨勒(Bickerdike-Robinson-Metzler)条件。但是弹性分析法理论实际上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出口国货币升值时,进口国货币出口价格与汇率同比例变动而出口国货币出口价格不随汇率调整。但大量的事实和经验研究表明,出口国货币出口价格是随汇率变动而调整的,即汇率变动对出口国货币出口价格的传递不为0。出口汇率传递意味着,即使是满足上述两条件,进口国货币出口价格只是随汇率变动部分调整,或者说“奖入限出”效应被打折了。这一现象意味着汇率政策的国际收支调节效果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比如,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对美元持续大幅升值并未导致美国对日本贸易的国际收支改善。再比如,2002年2月-2008年7月美元贬值了35%,但美国的消费品进口价格指数仅上升了6%。

通过1998年1月-2010年12月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价格总指数的动态传递效应的研究,可以发现:第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美元出口价格指数一年的累积传递率在50%左右,即人民币汇率变动一半体现为出口商的加成调整,一半体现为外币出口价格的提高,我国出口中存在明显的PTM行为。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效应大约被削弱了一半。第二,尽管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贸易的一半左右,但是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商的边际成本并无明显影响。原因可能在于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并未纳入厂商的人民币成本核算。第三,2004年7月-2010年12月的人民币汇率对我国以美元标价的出口价格的传递率明显高于1998年1月-2004年6月,可能的原因是2004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形成了人民币长期持续升值的预期。第四,人民币汇率出口价格传递的动态特征是开始快速完全传递,三个月开始回调,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PTM行为,一年后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的累积传递率为50%。

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十分清楚: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或者说我国出口定价中普遍存在PTM行为,这意味着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调节我国贸易顺差规模的政策效力是被大大削弱的。人民币汇率出口价格传递先快速完全传递然后逐步回调的动态特征,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的出口普遍选择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另一方面反映出了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度高,对出口市场的依赖性强,价格竞争仍是我国主要的竞争手段。如果人民币继续维持稳定的升值预期,长期的人民币汇率出口价格传递率会随之呈上升趋势。如人民币持续升值,长期而言,的确会提高支出转换效应的作用。进口需求和竞争者价格对我国出口价格都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影响我国出口定价主要反映的是供给因素而非需求因素,我国出口商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很弱。

14. 历史事件会长期影响汇率变化吗? ——关于人民币汇率与欧元汇率的比较

谢赤 岳汉奇(湖南大学)

《汇率收益率及其收益波动率存在长记忆性吗? ——基于人民币汇率和欧元汇率的经验分析》,《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2010年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屡次向中国施压,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次次推到了风口浪尖,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迭创新高,且升值状况仍在继续。汇率变化的“长记忆性”是指汇率的变化受到任何冲击都将会对其未来变化产生持续强烈的影响。那么,“中美汇战”会对人民币汇率变化产生持续滞后的冲击吗?中国是否需要实施适当的外汇干预?“汇战”影响下人民币波动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都亟需研究解决。同时,现有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发达金融市场与新兴市场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欧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中的新兴力量,自推出之日起就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双重撼动,但是它的国际地位依旧,市场对于欧元仍然抱有乐观的预期。那么,欧元汇率变化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理论上而言,汇率的变化主要通过收益率及收益波动率来体现。收益率反映着价格的变动情况,而收益波动率是对收益变化的度量,反映了汇率相关者所面临的风险程度。以往的研究发现,收益率长记忆性的存在与市场的成熟程度有关,而由于波动的集群性使得收益波动率普遍都具有长记忆性。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存在长记忆性,而欧元汇率收益率不存在长记忆性;两种汇率收益波动率都存在显著的长记忆性特征,但人民币汇率收益波动率的记忆长度大于欧元汇率收益波动率。

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存在明显的长记忆性,反映了人民币汇率的每日美元价格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每个价格都附着着在它之前发生的事件的“记忆”,并且这种信息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到价格的未来,因此通过技术分析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变化进行预测是可能的,汇率相关者可以参考人民币汇率价格的历史变化来拟定自己的决策。同时,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都具有长记忆性,说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必要的。这也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状态由于其显著的长记忆性的存在,可能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外汇管理当局可以综合分析信息的记忆长度,基于对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的准确判断,选择合适的干预时机和干预力度。

欧元汇率收益率不具备长记忆性,而人民币汇率无论是收益率还是收益波动率都呈现出非常显著的长记忆性,并且在记忆长度方面,人民币汇率波动率要大于欧元汇率收益波动率。从微观层面看,这体现了突发事件及其他信息能在欧元市场中得到快速传播及被欧元价格充分反映,而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中呈现长期滞后的影响导致汇率失真,因此欧元汇率相对于人民币汇率更能充分反映市场当前信息并及时做出相应变化。而从宏观层面看,这说明了欧元外汇市场的成熟以及人民币外汇市场的相对低效。这些差异的存在主要是由于:(1) 在外汇制度方面,人民币外汇市场是建立在资本项目管理、强制结售汇制和银行持有外汇头寸限制的制度背景下,导致了外汇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2) 在外汇干预方面,外汇管理当局的干预相对频繁且不透明,干预目标也比较狭隘,致使市场价格信号失真。(3) 在外汇交易方面,外汇交易品种、参与主体以及交换币种的单一,使得市场机制运作不充分。而欧元区有相对自由的外汇市场环境,交易品种多样,存在大规模的短期交易行为,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整个市场的信息,更有利于外汇干预的实施。因此,相对于欧元外汇市场,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发展还不成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健全人民币外汇市场，应该逐步提高市场的开放度，优化市场环境；改善干预和调节机制；加快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的研发，多元化外汇交换币种和参与主体，从而建立一个有弹性、有深度的外汇市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更能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及顺应时代的发展，成为历史上继英镑、美元之后的强势货币。

理论前沿动态

15. 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述评

伍业君 张其仔（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娟（西北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实现了令人瞩目的飞跃式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城市化和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逐渐培育出了一些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取得以上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中国的总量指标位居前列，但是人均指标却并不高。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突破4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阶段，这一收入水平无论是与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相比还是与世界人均收入水平相比都还存在很大的差异。不仅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经消耗殆尽，资本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在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中，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如何实现人均收入水平的华丽跃升，如何避免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等等，这些是中国在下一阶段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寻找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基础则是经济学界不可推脱的责任。

林毅夫等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遵循了比较优势，但是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解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现象，比如，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出口的产品不同，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等。所幸的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豪斯曼（Hausmann）等提出的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该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一个国家拥有的能力上，而能力表现为生产产品的种类多少和产品的复杂程度。一个国家生产产品种类多，拥有的能力就多，故而拥有的能力组合就多，生产新产品就更有优势；生产的产品越复杂，能力就越独特，被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小，创新能力就越强，发现新产品的机会就越多，所以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越多，产品越复杂，整个产品空间的结构就越复杂，位于该国的企业比较优势的演化就会相对容易，产业升级成功的可能性就大，进而产业升级断档的可能性就小，经济就容易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反之，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种类少，产品简单，这个国家的产品空间结构就稀疏，比较优势演化的过程就相对困难，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断档，导致经济陷入停滞的陷阱之中。

形象地说，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将产业升级比喻为猴子在森林空间的跳动，森林分布不均衡，有的地方稀疏，有的地方密集，产业升级体现为猴子从森林稀疏的地方往密集的地方跳跃，这个过程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森林空间的密集程度，如果森林很密集，则猴子跳跃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其次是猴子的能力，如果产品空间不够密集，但是猴子的能力足够大，能够越过稀疏地带而跳跃到密集处，这样产业升级也能够成功。反之，如果

猴子能力有限，而森林空间却又稀疏，这样猴子就算想跳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在稀疏的森林部分按照原有的方式发展，没有升级的空间，比较优势得不到演化，产业结构得不到优化调整，经济就只能在固有的水平徘徊。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森林中总存在一棵树，只要猴子想跳就一定能找到一棵树栖息下来，而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则告诉我们，产业升级存在一个最优距离，猴子在产业升级的跳跃中可能会由于产品空间过于稀疏、或者猴子能力不足而摔得粉身碎骨。这个理论不但很好地解释了世界经济发展中各国增长绩效存在的巨大差异，而且能描绘出一个国家的产品空间结构，为比较优势演化和产业升级提供明确的路径选择。对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述评，是该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它将为理论工作者敞开一扇大门，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合适的政策指导。

16.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态思潮——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综述

肖红蓉（华中师范大学）

《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评价》，《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由来，我们无需长篇累牍。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就能让普通人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就能理解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性经济学思想及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了。这个浅显的道理就是——生存与发展是人类本能的追求。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今天如此高的水平和如此巨大的规模，人类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之间的关系早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类经济活动所消耗的资源数量和自然环境所能承载的人类污染行为（包括污染物产生的规模与速度）的能力已经接近甚至超出了自然生态的承受能力。20世纪末以来引起全球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就是典型的环境承载力濒临耗竭的危机。地球资源与生态环境能否支持人类这样无限制的索取？人类能否永续生存、永续发展？如何解决人类永续生存与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导致的生存发展条件日益恶化之间的矛盾正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

自“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后，以“可持续发展”为对象的研究逐渐延伸到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众多领域。经济学也不例外。“可持续发展”思想对经济学的渗透导致了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循环经济学、低碳经济学等新兴经济学科的诞生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生态伦理观，自然资源（资本）的价值理论，可耗竭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环境公共物品与外部性理论。

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就是在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该学科的研究目的是为了适应现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使经济学理论能够对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和人类

行为有更加贴切的体现、更加准确的描述、更加有效的说明力、更加贴近现实的指导性。资源的无限供给、增长的无极限性、微观个体的经济人理性、消费主义乃至国民经济核算等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有着不相容的矛盾，也就使得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成为了经济学改造所必须解决的基础问题。”

现代社会的经济繁荣和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活动实践的结果。西方可持续经济学则对传统主流经济学思想提出了质疑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与修正。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价值取向、研究方法、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的配置、自然资源与人造资本的关系、经济增长等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可持续性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和理论存在一些异同。尽管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不太成熟，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已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态革命仍将继续。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自 1980 年创刊以来，本刊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CSSCI 来源期刊。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态势，《经济评论》适时调整和更新研究主题，强调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大力扶持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与国际学术刊物规范接轨的力度，不断提升《经济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 27 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全国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排名第 4；根据最新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在全国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位居第 5。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 (<http://jer.whu.edu.cn>) 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